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小说家



何满子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小说家



何满子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小说家

何满子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5 字数 115,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325-0677-0

I·403 定价：2.80元

前 言

孟子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每个读小说的人也应该而且希望了解创造这部小说的作家。你理解了这位作家，便更加理解这部小说，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因此，我们为读者提供1840年以前中国小说史上最重要的十位小说家的情况，这十位小说家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创作者的代表。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小说进入了过渡到现代小说的转形期。介绍近代小说家让我们留待别的机会。

所选择的这十位作家都是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甚至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他们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演进，不论从

小说美学和小说文体论的角度，把这十位的作品连贯起来，就几乎是一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国最早出现的合于现代小说艺术概念的作品是唐代的传奇，因此第一位就选了唐人传奇的代表作家，至于为什么偏偏选中张鷟，读者可以从《张鷟》篇了解原委。接下来说的是宋元人的“小说”（短篇）和“讲史”（长篇）了，但那时的小说作家（说话人或书会先生）都是无名氏，而且其中长篇小说还没有成熟，短篇小说传下来的都经过了后人的修改，因此本书选了一位整理编辑这类前人短篇小说（他本人的短篇、长篇小说也都有很多成就）的代表人物冯梦龙，若干地弥补这段空白。接下来便是宋元以来积累型小说的三位写定者：施耐庵、罗贯中和吴承恩。这三位有历来传播最广的三种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标准的历史小说；《水浒传》虽也是历史小说，但已经跟“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吴自牧《梦粱录》）的“讲史”不全相同，而是写社会斗争的小说了；《西游记》则仅以历史题材为因头，而从历史小说中独立出了神魔小说的新品种，并且是在这几种积累型的小说中，最显出了作家的个人风格融解了群体风格的作品，它是中国小说由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过渡。接着，文人创作长篇小说的新史页揭开了，《金瓶

梅》是小说艺术的个体意识觉醒的第一部杰作。冯梦龙以后，随着白话短篇小说的衰歇，文言短篇小说的大师蒲松龄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继起的是吴敬梓和曹雪芹这两位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人物。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吴敬梓则不论在题材、意识和叙述方法上都表现了摆脱古代小说传统格局的努力，是一位开创型的作家。在这两位大师以后，古代小说进入了退潮期，这里选择了李汝珍作为最后的代表。

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在现代，小说的艺术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水平与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在我国古代，精神界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文人是鄙视小说，认为它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官修的图书目录如正史的“艺文志”之类不录小说书目；正统的总集如《文苑英华》、《全唐文》不收传奇，《四库全书》不收小说（它收的“小说家类”为与小说艺术完全是两码事的杂事、异闻、琐语之类的笔记），正史的“文苑传”没有小说家的传记。在这种鄙视乃至敌视小说的空气中，古代小说家也大都不愿出头露面，很多只署一个别名。在材料少得可怜的情况下，后人只能从有限的通常是偶然的记载中，曲曲折折探索到一点小说家的生平。本书中的十位小说家的事

迹，几乎无一不是经过了不少研究者的辛苦考证才获得的。有几位的事迹迄今还有争议。例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些学者甚至怀疑他的存在；《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国内外的少数学者近年来还在对他的著作权提出疑问；至于《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真实姓名，至今也还是研究者争论的热门题目。为此，对这些作家的情况，只能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叙述，有争议的就反映出争议，并提出自己的判断；但各篇作者都避免那种“把古史辨得精光”的“夏禹是一条虫”的做法。

而幸亏作品具在，作家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既然理解作家的目的在于理解作品，而且若要真正理解作家本人，作品也是第一手的和最可靠的材料；因此，在作家生平资料有限的各篇中，大都较侧重于从小说的分析勾勒出作家的精神面貌，并由作家的风格推及时代风格，即他所处的时代意识和社会精神心理状态，并进而揭示出他们在中国小说美学上的贡献，小说创作方法的艺术性格。总之，刻画作家的心灵重于刻画作家的肖像。而且，在论述中还联系到中国小说文体论和美学上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也在一定限度内辐射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现象的变迁。

担任本书撰述的作者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他们治学的方法、考察问题的取向、揭示对象的层面虽各不相同，每位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很少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谈，有些篇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有些见解还称得上是很新颖的，其中也有少数篇由于材料关系，只是客观的综合叙述，但对理解古代小说都不无用处，对小说欣赏和小说的专业研究者或能提供知识，或能提供启发。当然，本书的作者是希望自己的论叙得到读者的验证的，他们都委托编者在此向读者和专家转达请求批评指教的诚意。

何满子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1	前 言.....	何满子
1	张 懿.....	何满子
22	施耐庵.....	杨志明
42	罗贯中.....	张仲谋
65	吴承恩.....	宁宗一
89	兰陵笑笑生.....	李时人
113	冯梦龙.....	魏同贤
141	蒲松龄.....	孙菊园
156	吴敬梓.....	鲁德才
181	曹雪芹.....	魏同贤
206	李汝珍.....	李时人

张 鹭

有些读者也许不理解为什么把张鹭列为中国古代的十大小说家之一，根据是什么？是不是将他拔高了？他传下来的小说不是仅仅只有一篇《游仙窟》么？为什么对这篇小说，从而对这位作家要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呢？

让我们费点篇幅，先来说明这个问题。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句话有着十分丰富深刻的涵义。它不仅指出了唐代叙事文学作家创作上的主观意识的觉醒，开始了自觉创作小说的纪元，而且也在对主体觉醒这一事实的揭橥中，标明了中国叙事文学

的最高形式——小说艺术到唐代进入了正式形成的阶段，从此结束了中国小说的前史，小说史的新一页揭开了。

文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内部规律。一些文学史家往往以政治经济、阶级斗争等社会有形构成来解释文学的兴衰演变，例如，谈到唐代文学，它的诗歌和传奇的繁荣，首先就归因于唐代经济的高度发展，贞观、开元时期政治的稳定，国力的强盛，再就是科举制度如何对文学繁荣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此类。这些社会条件当然对文学发展有影响，但不论它有多大作用，也不过是文学的外部条件，而不是文学发展的内部根据。这只要提出一点事实就可以证明：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但现存的近五万首唐人诗歌中，压倒多数的是抒情诗，称得上精彩叙事诗的，就只有《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等不到总数的万分之一的极少几首。这是什么原因呢？岂不正是因为抒情诗有《诗经》以来汉、魏、六朝的诗歌艺术经验的丰富积累，而叙事诗则缺乏这种历史经验，也即是说，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着唐代诗歌的繁荣及其特点，社会背景只是对这种发展起着有利的促进作用而已。中国最早的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叙事文学——传奇之出现于唐代，也必须从叙事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根据去体察。

在中国小说前史阶段，虽也有为数极少具有小说艺术规模的叙事作品，如曹植的《洛神赋》（可说是韵体小说）和陶潜的《桃花源记》，但以叙事文学的总体现象言，叙事艺术大抵依附在史传、野乘、谈片之中，即使通常归为小说的志怪书和志人短札，如《搜神记》、《世说新语》之类，也大体还是说故事和丛残小语，顶多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型。中国的叙事文学不像西方那样拥有像希腊神话和史诗的渊源，中国先民的神话传说除了湮灭的以外，大多被改头换面地吸收入正史当作史实来流传了。因此，首先是在正史，然后在野史和志怪、志人书中，陆续地和分布面极广地积累起叙事文学的艺术经验，而且这些艺术经验大抵还不是有意识地创造叙事艺术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这些悠久的叙事艺术的积累，到了唐代，积渐酝酿到要求有更高形式的叙事文学的出现，同时，在这一叙事艺术的历史传统培育下的创作主体，他们的艺术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能够响应这一历史的呼召。主客体条件的结合，便出现了崭新的叙事艺术的文体——传奇。传奇这一符合现代型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出现，首先和主要就是由中国叙事艺术的内部规律决定的。缺乏长篇史诗传统的中国小说，只能秉承自己传统艺术经验积累的特点，而以短篇小说踏上小说史的第一步，

而不像西方那样先有长篇小说的兴盛（西方早期的近代型小说，由于史诗的传统，即使事实上是短篇，如《十日谈》等，也一定要连缀成长篇小说的形式，大量的短篇小说直到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然后才出现短篇小说繁盛的局面，这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所决定的。

应不应该给中国小说史这一划时代的现象，中国古代小说的奠基者，小说艺术的第一批创造者以重要的位置呢？肯定应该。十大小说家应该有传奇作家的代表。

唐传奇从七世纪的初唐开始出现，八世纪进入繁荣期，到十世纪初的晚唐衰退，三百年左右涌现出成批的作家和大量迄今还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么，应该选谁为代表作家呢？

确实，如果选最早的一位作家为代表，他应是由隋入唐的《古镜记》作者王度；如果以作品对后世的影响而论，则应推《莺莺传》的作者元稹，《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等人；如果论作品的数量之多，则应推《玄怪录》的作者牛僧孺，《传奇》的作者裴铏等人；如果论艺术创新和小说美学上的成就，则应推《枕中记》和《任氏传》的作者沈既济。

那为什么单单以张鷟为代表呢？

在选择唐传奇的代表人物时，这确实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难题。八世纪大历、贞元以后的大批作家，影响都较大，作品各有各的长处，不能说究竟谁比谁高出一头，要抽出一个代表来很难摆得平；以作品较多的牛僧孺、李复言、裴铏等人择取一位吧，在牛僧孺以后，传奇艺术已呈下降趋势，从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衡量，都不能代表唐传奇上升期作品的成就；合理的办法只有从传奇的最早创作者中选取代表人物。今传的最早传奇有三篇，王度的《古镜记》以其体制言，还是志怪故事的连缀，美学形式的基调没有脱尽六朝叙事文学即小说雏型期的旧套；稍后的《补江总白猿传》虽已是近代小说型的传奇，但它是无名氏之作。接下来有主名的作品就是张鷟的《游仙窟》了。因此，以创作年代论，张鷟最具有代表资格；而且还因为，从小说的篇幅言，《游仙窟》是唐人传奇中字数最多的一篇，从唐传奇直到清人蒲松龄以后的一系列文言短篇小说中，超过《游仙窟》篇幅的也只有元明之际宋梅洞所作的《娇红传》和清人陈球的《燕山外史》等可数的几篇，而艺术成就都远逊于《游仙窟》；而且以影响说，《游仙窟》如果不是由于在宋以后长期失传，它的影响肯定不下于别的传奇，唐代不少作家的传奇曾受其影响是很显然的，这点从下文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它

从出世不久后传入日本就在彼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它的生命力的明证，这点后面也将提及。

这就是选取张鹭作为中国最早的小说艺术的代表而列入中国十大小说家的理由。

张鹭的生平可考的材料不多，只有新、旧《唐书》中附见于《张荐传》的有限记载以及刘肃《大唐新语》、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中的片言只语。所以对他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近似的面貌。

张鹭(约660—740)，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他的命名为“鹭”，据两《唐书》说，是因为他幼时梦见一只紫色的大彩鸟飞临庭院，他祖父认为紫色的大禽是凤类的鹭鹭，征兆着以文章显扬家国；表字“文成”正由此而来。他于高宗李治调露年(679，调露纪元仅一年)登进士第，主试的考功员外郎、当时著名文人窦味道读了他的试卷，叹为“天下无双”。被任为岐王府参军。此后又应“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八科考试，每次都列入甲等。调任为长安县尉，又升为鸿胪丞。其间参加四次书判考选，所拟的判辞都被评为第一名，当时有名的文章高手、水部员外郎员半千称他有如成色最好的青铜钱，万选万中，他因此在士林中赢得了

“青钱学士”的雅称。这个雅号后代成为典故，成了才学高超、屡试屡中者的代称。武后证圣(695)时，擢任御史。张鷟性情偏躁下急，且又风流自赏，行为放荡，不检点小节，为恪守礼法的官僚士大夫所蹙眉疾首，执政的姚崇对他尤为鄙视。玄宗李隆基开元初(约714)，御史李全交劾奏他讥讽时政，贬谪岭南，幸亏刑部尚书李日知的救护，不久移到内地。最后回朝任司门员外郎而终。以上的仕宦经历均见两《唐书》。此外，《大唐新语》中记载他曾一度任洛阳尉，时间未著录，只提到在洛阳时曾作《咏燕诗》，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极为当时人所讽咏。《桂林风土记》又说他“弱冠应举，下笔成章，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尉。”按，据两《唐书·薛元超传》，元超任中书侍郎系在高宗上元三年(676)至永隆(680)时，永隆即张鷟进士中式的调露年的后一年，由此可肯定张鷟任襄乐(今甘肃庆阳附近)尉是在他年青时入仕之初。《游仙窟》题作“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小说中说“仆从汧陇，奉使河源”，地望也相合，可证是他年青时的作品。古人著作不署名而署字，也有先例，如晋人常璩作《华阳国志》就题作常道将，也用的字，张鷟并非独创。

关于张鷟的文名，两《唐书》虽有贬词，但不

能掩盖他的知名度。《旧唐书》说他“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说“鹭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消芜秽，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两《唐书》还一致记载：“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是突厥的可汗），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曰：‘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幸亏国外读者的倾赏，《游仙窟》在张鹭在世的开元间已传到日本，日本嵯峨天皇（约当唐元和、长庆间）时已在日本广泛流传，为日本古代作家所引述并从中汲取灵感，于是才能在中土湮没千余年以后，于上世纪末重返故国。

张鹭的其他著作，今传者仅《朝野佥载》六卷和《龙筋凤髓判》四卷，其他均已亡佚。《朝野佥载》是纪时政、世情、传说、轶闻的笔记，以士大夫传统观点看，确是“浮艳”“诙谐”之笔，因其采录不取历史家或掌故家的角度，而是取文学家的角度，提供的是一些有趣的乃至怪异的谈片，形象也相当丰满。《龙筋凤髓判》是书判的范文集。唐代考选官员，“凡择人以四才”，“四才谓身、言、书、判”（《旧唐书·职官二》），其中判词的考试，最能